

谢耀基 陈炽洪 主编

苗缘论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苗缘论集

谢耀基 陈炽洪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羴缘论集/谢耀基, 陈炽洪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81135 - 668 - 7

I. ①羴… II. ①谢…②陈… III. ①语言学—文集②文学—文集
IV. ①H0 - 53②I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689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81 千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言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还记得念大学时，对《诗经·樛木》赞美后妃逮下之德的说法，作过议论。料不到三十年后，今天编辑这部文集，竟蓦然忆起了这首诗，另有一番情味。“乐只君子，福履成之。”这诗蕴涵的，是树与藟的缘分，是送给君子的祝福。

人生匆匆，聚散无常，但信是有缘。论集中二十多位作者，散居在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在学术界、教育界各有发展。他们有的彼此认识，有的未尝谋面。现在聚文结集，共同的因缘，就是从前在学习阶段，都曾得到同一位老师指导，认识了这样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学者——李家树教授。

李教授任职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博通古今，尤长于诗经学与现代汉语学，著述等身，卓有成就。他投身教学工作，同样严谨认真，孜孜不倦，培育英才，扶掖后进，皆见心力。数十年来，受教、受益之士，难计其数，真可谓桃李满门，“葛藟萦之”。

李教授勤奋经年，行将荣誉退休。荣誉退休，是他人生前期卓越工作的一个总结，也是后期崭新生活的一个开始。苏轼《喜雨亭记》说：“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教授荣休之喜，与周公得禾、叔孙胜狄之喜，虽大小不齐，但同样值得纪念。《藟缘论集》的编辑和命名，就是为了记下这份喜悦、这份情缘，以示不忘。

教授尊名家树，与树亦有一段缘分。他埋首工作的办公室，窗前庭中有一棵白兰树，亭亭如盖，每至夏天，花开满枝，白绿相间，煞是好看，轻风徐来，芳香四溢，幽远益清。岁月无痕，树与人原来不觉已相伴了数十寒暑。李教授来年荣休，正值学院迁移至新建的百周年校园。除旧布新，难免



倍有所感。不过，缘自心生，纵然人去楼空，清影弄舞，但花树犹茂，馨香叶绿，只要心之所知，不必攀条折荣，也可缘遗所思。

是书得以顺利出版，实有赖论文作者的热心支持，以及林宇珊、钟明慧、李战、侯丽庆、王勇诸君的鼎力襄助。集中二十三篇文章，是二十三份祝福，祝愿李教授在人生的新阶段，得享福履，得享快乐。

谢耀基 陈炽洪 谨识
2011 年 1 月于香港大学

目 录

序言	谢耀基 陈炽洪 (1)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观	叶淑兰 (1)
《和合本》在中文圣经多元系统中的位置	
——前景与挑战	庄柔玉 (19)
《红楼梦》众文体的作用	孙爱玲 (28)
一个女子的革命体验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解读	李仕芬 (47)
卢逸岩与香港书法教育	李晋铿 (61)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与清中叶以后的词学发展	李蕴娜 (78)
现代汉语关联副词研究史小识	杨康婷 (95)
张爱玲的书信演出	
——自夸与自鄙	苏伟贞 (110)
谈汉字中一些与“手”有关的部件	吴长和 (123)
沦陷中的家国情怀	
——上海女作家小说分析	余婉儿 (131)
故园之念	
——康有为之新马诗歌研究	张克宏 (148)
知性散文的修辞美学	
——论龙应台知性散文的文字技巧	张美足 (165)
中译法律文件须注意的地方	陆文慧 (184)



从改革到规范

- 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 陈炽洪 (204)

新加坡社会语言土壤下的华语文学习

- 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为例 陈桂月 (219)

诗的美学

- 从视觉到自觉的美感观照 陈惠英 (230)

南下的五四水手

- 许杰与新马华文文学 周维介 (238)

- “只要”和“只有”的句法语义探析 徐秀芬 (255)

- 老舍短篇小说不同版本的比较与研究 符传丰 (269)

- 《诗经》字词运用二题 谢耀基 (293)

- 现代汉语复句及句群的比较 黎少铭 (307)

- 香港中文科的校本评核 黎国伟 (327)

一往有深情

- 读黄仲则诗歌的方法 潘步钊 (341)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观*

叶淑兰

张天翼专门讨论儿童文学问题的文章不多，他有关儿童文学的意见，散见于一些书信、作品的序跋，以及他从事儿童文学活动（1949年以后）的发言中。本文即根据这些资料归纳、分析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观点，并说明他的儿童文学观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1949年以前的儿童文学观

1949年以前，张天翼虽然写过令人瞩目的儿童文学作品，但他不像茅盾、郑振铎那样同时以理论的形式提出自己对儿童文学的见解。我们只能从他当时几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以及他晚年总结创作经验的文章中，察知他的某些观点。

（一）对30年代童话的批评

在《〈秃秃大王〉序》和《〈奇怪的地方〉序》这两篇序文里，张天翼采用与小读者对话的形式，告诉小读者当时流行的童话都是“哄人”的。

张天翼不满当时的童话领域被国王、公主、神仙、魔鬼、宝物一类故事所垄断，也不满这些故事陈陈相因：公主一定是好人，而且很美丽；王子也是好人，而且很聪明；魔鬼最后一定被神仙制服；哥哥欺负弟弟，弟弟一定会得到神仙的帮助成为富翁；神仙还会帮助贫苦的孩子娶公主为妻，并且做了国王。

张天翼认为这些童话“说来说去总是这样”^①，而且更严重的是灌输给儿童迷信、好逸恶劳、金钱万能等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孩子们的思想受到腐蚀，于是不想念书，也不想做事，甚至连自己和国家受人欺侮时也不思反抗，以为神仙会现身相助。

张天翼用一句话来否定这类童话——“这全是瞎想出来骗人的”。至于人们为什么要瞎想出这些故事来，张天翼则从三方面来说明：第一，古人没有常识，

* 本文原载《张天翼儿童文学研究》（香港大学1992年硕士论文），部分内容、文字曾作改动。

① 《〈秃秃大王〉序》，沈承宽：《张天翼文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320。



用菩萨、妖魔的故事来解释自然现象，这些过时的故事“应该请古人去听”；第二，一些“不长进”的人迷信神仙，因此瞎编这类故事；第三，一些“欺侮人的人”和“想拍欺侮人的人马屁”者，为了“叫我们上当，叫我们懒惰，就好来调摆我们”，所以编故事来骗人。^①

张天翼所说的第三类编造故事者指的是什么人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儿童文学界的情况，就很清楚了。1935年3月，中国政府规定该年从8月1日开始的一年为“儿童年”，于是全国各地都纷纷推行读书运动等有关活动。在左翼作家和评论家看来，政府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哄哄人罢了。他们认为那些由政府授意出版的书刊都是庸俗的、陈腐的，“或多或少的含了毒质”^②的。张天翼在这“儿童年”里为自己的童话写序文，他对那些出版所谓“不良”读物的“欺侮人的人”和“想拍欺侮人的人马屁的人”，自然要批评一番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处于起步阶段，在童话方面，主要是模仿、改写外国作品和中国古代作品，个人创作的童话比较少见。这样一来，就逐渐出现了故事公式化、内容陈旧的问题。张天翼虽说是本着左翼文艺观来批评当时的童话，但其所论也未尝不是事实。

另外，张天翼的批评也未免矫枉过正。他反对写神仙和宝物助人解难致富的故事，认为这些故事不真实，思想也不正确。可是，如果完全否定神仙和宝物作为正面形象存在的意义，那么，童话创作在人物形象和宝物形象的塑造上就会受到束缚。童话中的超人形象[如意大利科洛狄(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中的仙女]与宝物形象[如16世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的神灯]，往往是正义的代表或希望的象征。这些幻想形象在童话创作中作用很大，而且能够带给儿童愉悦感，陶冶他们的性格与情操。张天翼反对写神仙和宝物的意见是颇为偏激的，而且，这对他的童话创作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 论儿童文学的作用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在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关的研究多从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儿童本位论”出发，强调“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中心，为儿童

① 《〈秃秃大王〉序》，《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322。

② 1935—1936年的“儿童年”期间，茅盾、孔罗荪等人曾撰文批评当时的儿童读物。孔罗荪(1912—1996)认为那些儿童书“或多或少的含了毒质”。参《关于儿童读物》，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96。



的需要和兴趣服务。^①

20年代中期以后，儿童文学受当时风起云涌的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转而强调政治教育作用。

张天翼在30年代并未正式提出以儿童文学“教育”儿童的主张，但是，从他的文章仍然可以窥见他这个意思。

他严厉批评当时流行的童话，是因为那些故事都是“空想”出来“哄人”的，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他批评道：

这些东西在当时那个社会里对小读者能起什么作用，是很清楚的。有的人就是上了当，被欺侮一辈子，神仙、菩萨也没有来过。^②

张天翼进一步表示要把儿童文学由“空想”拉回到“现实”中来。他说：

听不懂的——有什么好玩呢？

我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想要说真的事情。你跟我——都是真的人类。我们过的日子也是真的……只要不是一个洋娃娃，是一个真的人，在真的世界上过活，就要知道一些真的道理。看好书是学真道理。听好故事也是学真道理。^③

张天翼既然认为“看好书”和“听好故事”都是“学真道理”，也就是说，他认为儿童文学（“好书”、“好故事”）具有灌输儿童“好”思想的作用。因此，他在《〈奇怪的地方〉序》中问小读者：“这个故事好不好呢？能不能够使你得到一点儿益处呢？”^④

在40年代写的《一个故事的故事》中，张天翼则明确地指出儿童文学有“教训”少年成为“中国新少年”的作用。他说：

故事总是说明一点道理，含一个教训的。有的是说假道理，有的是

① “儿童本位论”是西方的教育理论，杜威是提倡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教育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进行教育。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后，他的观点对当时的教育界和儿童文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页8—11。当时，周作人、郑振铎等人提出的儿童文学主张，便受“儿童本位论”影响。例如周作人说：“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参周作人：《儿童的书》，《儿童文学小论》，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57。）又说：“……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参《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小论》，页38）

② 《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358。

③ 《〈奇怪的地方〉序》，《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331。

④ 《〈奇怪的地方〉序》，《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332。



说真道理。有的想要教训我们去做小老头儿，有的可教训我们做一个中国新少年……^①

张天翼很明显是把儿童文学当作灌输思想的工具的。这个观点源于左翼文艺理论，和20年代初一般的儿童文学观可谓背道而驰。在这种儿童文学观支配下，张天翼创作时，总是亟亟于把他眼中的“真的世界”展示出来，希望少年儿童从中认识“真道理”，成为“新”的一代。他的作品即体现出他的这个儿童文学观。

二、1949年以后的儿童文学观

1949年以后，张天翼讨论儿童文学的文章，以呼吁人们关心重视儿童文学的创作、评论与阐明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性质、作用为主，同时也涉及具体的理论问题（如创作方法）。在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张天翼曾对5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做过概括式的批评。至于个别作品，他曾经评论过孙幼军（1933—）、金江等作家的童话。^②以张天翼当时在儿童文学界的地位来说，他应该给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和作品提过意见，但因为未见诸文字，我们也就无从考察了。

本节主要根据张天翼1949年以后的20篇文论和书信，分五个方面探究张天翼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观。

（一）对50年代儿童文学的批评

50年代初，中国全面地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儿童文学经验，因此，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作家的创作则相对地十分少见。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来说，这个局面自然必须扭转过来。

张天翼注意到这种情况并提出了批评。他在《我要为孩子们讲一句话》中指出当时的儿童读物以翻译作品为主的现象。他并不否定好的翻译作品，但他更希望看到中国作家的创作，因为：

……这所写的生活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语言是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所以特别感到亲切，爱读；还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有一种中国

① 沈承宽编：《张天翼文集》（第9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991，页101。

② 孙幼军是童话作家。他的《小布头奇遇记》于1961年出版，颇受小读者欢迎，并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0）。参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济南：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页275。根据《中国少年报》一位编辑1962年的日记记录，张天翼曾表示《小布头奇遇记》“是一本不错的作品，但并不是没有缺点”。参沈腴正、聪聪：《张天翼和中国少年报》，沈承宽等编：《张天翼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页17。金江的童话集《鼻子》出版单行本时曾引起争论，浙江人民出版社为此征求张天翼的意见，张天翼于是提出了他对这本童话集的看法。参《复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一封信》，《张天翼文集》第9卷，页417—418。



人民的自尊感和自豪感……^①

此外，张天翼对当时儿童读物的“质”也表示了不满。他认为儿童读物中的文学创作，好的作品“为数不多”，“大部分作品对孩子们不够有吸引力”。他借用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话批评道：

我们目前一般的作品总不免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孩子们不爱看。^②

不过，张天翼对这类作品的批评是温和的，因为它们“无害”。这些作品尽管“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还不够高”，“小孩子看了没味道”，但“那些作者究竟是认认真真在写，想通过作品来教育儿童的”，“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张天翼还鼓励这些作者“慢慢提高”水平，说他们“不是没有希望的”。^③

反之，对于另一类“有毒素”的“坏书”，张天翼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所谓“毒素”是指“迷信、封建、黄色”等。他批评一些书商重印1949年以前的“坏书”，甚至“拉拢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印书赚钱”。^④

他也指出“坏书”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儿童读物奇缺的缘故：

孩子们也像大人一样需要文娱活动，需要课外读物……给他们的作品少得不成话。连“小人书”都很少是专为小孩子的。于是孩子们只能够到手什么就看什么，不管是不是超过自己的阅读能力，也不管内容好坏……孩子们在这方面闹饥荒，饥不择食地连有毒的东西也拿来吃，而且已经有我们的孩子中了毒了。^⑤

因此，他希望作家们写评论文章：

我们作家也责无旁贷，要用作品去争取这些青少年们，要向群众揭发那些有害的读物并推荐好的读物。^⑥

50年代中、后期，张天翼继续关注儿童文学创作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不足的问题，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还“只不过是儿童时代”，“儿童文学作品（连我的

① 《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23。本文原刊于《北京日报》，1953年11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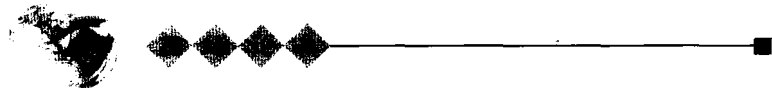
② 《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24。

③ 参《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24；《谈谈儿童文学问题——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张天翼文集》第9卷，页423。

④ 参《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24。

⑤ 参《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25、227。

⑥ 《“作家们不要再沉默了”》，《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28。



在内) 都还幼稚, 都有缺点”。^①

此外, 他对当时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以为写儿童文学“不要深入生活”的看法, 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

这些人的作品孩子不看, 大人更不看, 人们批评他们不了解孩子的生活, 不懂得孩子的心理, 乱写一通, 毫无趣味。^②

张天翼上述种种评论, 虽不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但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批评, 颇能切中时弊。可是, 在 1960 年发表的《我们对当前少年儿童文学的一些意见》(与严文井联合发表, 以下简称《意见》) 中, 他回顾 50 年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概况时, 却明显地顺应文艺潮流, 作出过激的、非学术性的评论。

对于那些所谓“有害的作品”, 他从前仅批评它们含有“毒素”, 这时则直斥它们为“毒草”。他说:

但几年来, 也出现过一些有害的作品。有的美化地主阶级, 宣传个人奋斗; 有的攻击新社会, 丑化农村干部; 有的嘲笑飞跃和理想, 以小市民的人生观, 向孩子们进行安分守己的说教。有些所谓整理的民间童话, 翻来覆去地描写神仙赠宝, 要啥有啥, 向少年儿童灌输发财致富、喜逸恶劳的思想情感。有些所谓儿童创作的诗歌, 满纸风花雪月, 虚无缥缈, 引孩子们脱离现实, 幻想去当神仙。这类作品, 数量虽然不多, 但说明, 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 仍是当前最值得警惕的危险。除了创作方面有毒草外……^③

反之, 对于大多数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 张天翼则给予好评, 认为“许多作品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起解放以前有质的飞跃”。

所谓“质的飞跃”, 是指作品主题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加强了”, 题材和样式也“较前丰富多样了”。张天翼在这方面做了具体的说明, 他说:

从前很少或简直不让钻进儿童文学的门的一些主题和生活的方面, 现在也写给孩子看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新人新事, 从孩子们自己的生活、少先队生活, 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人物、新品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作品里有所反映了。最近两年, 还开始出现反映我

① 《复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一封信》,《张天翼文集》第 9 卷, 页 417。

② 《谈谈儿童文学问题——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张天翼文集》第 9 卷, 页 425。

③ 《中国青年报》, 1960 年 8 月 5 日。这是张天翼和严文井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摘要并加小标题。

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某些侧面的作品。此外，还把眼界扩到全世界，把咱们孩子所关心的国际上的一些问题，做了诗和散文的主题。写革命斗争的英雄故事，以前很少的，现在逐渐多起来了……孩子们很喜欢阅读革命斗争回忆录……^①

以上是张天翼对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所作的具体介绍。如果结合他的其他言论来看，他对上述主题与题材的肯定其实有点儿言不由衷。例如，1959年，他曾经批评某些儿童文学作家“没有生活还是在写作品”，批评他们抹杀“表现现代儿童新品质的作品”；^② 1961年，他曾经针对当时儿童文学作品公式化与概念化的问题发言；^③ 1981年，他为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的作品写序时，称赞他“没有为配合政治任务去追求所谓的‘重大题材’，也没有因为有人说儿童文学应以塑造‘工农兵成人形象为主’而放弃反映孩子们的现实生活”^④。

在评论张天翼对50年代儿童文学作品的看法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情况。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界一致认为50年代是“五四”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尤其是50年代中期（1955—1957），更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⑤

但是，由于当时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把儿童文学视为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一般作品的说教味道其实颇浓，艺术性则相对显得淡薄。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儿童文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⑥ 儿童文学的发展因此受到挫折。在创作方面，作家们更加贴紧政治，往往按某项具体的政治政策写作，以致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日趋狭窄，表现形式也逐渐模式化，缺乏艺

① 《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5日。

② 《谈谈儿童文学问题——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张天翼文集》第9卷，页425—426。

③ 张天翼1961年8月10日在北京市儿童文学座谈会上发言，针对当时作品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提出意见。有关发言的记录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篇名为《从人物出发及其他》。

④ 参《〈刘厚明小说剧本选〉序》，《张天翼文集》第9卷，页465。

⑤ 参蒋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页11、20；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页3。

⑥ 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儿童文学界展开了对童话《慧眼》和儿童连环画《老鼠的一家》的批判。它们被指为“反社会主义”的作品。1958年，儿童文学界对童话创作提出了“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的批评。于是，一批描写古人、动物的童话作品及其作者都遭到了批判。同年，《小朋友》和《少年文艺》两个刊物被认为“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它们的办刊方针则被指为提倡“亲切论”和“趣味论”。1960年初，文艺界开始了对“人性论”等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1960年5月和6月，宋爽与何思分别撰文批判陈伯吹，指他鼓吹“儿童本位论”、“儿童文学特殊论”，实际上是“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反映。之后，张天翼、严文井和其他作家也参与有关的批判。陈伯吹的理论最后被判定为资产阶级“童心论”。参蒋风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页163—170、183—185；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页12、172—173。



术感染力。茅盾曾经批评1960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①，这也正好可以作为50年代后期多数作品的一种概括。

那么，为什么在《意见》一文中，张天翼对这方面的偏差却不作任何批评呢？其原因并不难理解。“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②，儿童文学界在这一年批判了所谓“儿童文学特殊论”、“童心论”等。在这种形势下，张天翼发表意见时便有所保留了。

虽然如此，张天翼在《意见》一文中究竟还是作了某种暗示的，他说：

我们应该有所提倡，但这决不意味着此外的就要受到排斥。我们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思想教育孩子们，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但也要从实际基础出发。^③

这里，张天翼提出了不要排斥其他主题和题材的主张，更婉转地指出了当时作品脱离实际生活的问题。

（二）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看法

1960年年初，中国文艺界开始批判“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宋爽（1927—？）于这一年5月发表了《“儿童本位论”的实质》一文，批评儿童文学作家与理论家陈伯吹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指出陈伯吹鼓吹的是“儿童本位论”（或“儿童立场论”），说“儿童本位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一种反映”。^④6月，何思的文章《什么样的翅膀，往哪儿飞？——破陈伯吹童话之“谜”》则批评陈伯吹的童话理论是“幻想论”。^⑤8月，张天翼和严文井在第三次文代会上联合发言（即《意见》一文），谈的主要是“儿童文学特殊性”的问题。

在发言中，张天翼先判定“儿童立场论”者所说的“儿童文学特殊性”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他批评“儿童立场论”者过于“夸大”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认为“儿童立场论”者强调“儿童本质”、“儿童情趣”，想做到“艺术

① 《一九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见孔海珠编：《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页490。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学》，1961年8月号。

② 《一九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茅盾和儿童文学》，页468。

③ 《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5日。

④ 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页732—740。本文原刊于《文艺报》，1960年第10期。

⑤ 参蒋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页11、20；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页3。

第一”的结果，是想使儿童文学变得与成人文学截然不同，使儿童文学不能为政治服务。他们的创作理论也有问题——“强调空想和鸡毛蒜皮”，主张“只能写孩子的身边琐事”，“不能写重大题材和激烈的斗争”。此外，张天翼也批评“儿童立场论”者夸大童话中的“幻想”作用，是要引导孩子去“梦游”，去“雾里看花”，换言之，是“反对少年儿童文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反对对少年儿童进行生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最后，张天翼指出“‘儿童立场论’实质上就是‘人性论’的变种”，而“儿童立场论”者所谓“儿童本质”、“儿童情趣”，则是“他们把‘人性论’运用到儿童文学领域内来变的戏法”。^①

张天翼在《意见》一文中并未点出陈伯吹的姓名，而且他的意见与宋爽、何思如出一辙。因此《意见》一文，与其说是对陈伯吹“儿童立场论”或“儿童文学特殊论”的批判，毋宁说是张天翼对有关问题的公开表态。

其实，张天翼在《意见》中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所说的“儿童文学特殊性”，与“儿童立场论”者是有分歧的。分歧在于：他认为“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年龄特征”，而且，时代、社会和家庭对他们也会有所影响；“儿童立场论”者则认为“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不论什么年龄的孩子，本质上都是一模一样”。

张天翼进一步说明自己因为着眼于“不同”，所以主张按照不同年龄孩子的具体情况（知识、兴趣、接受能力、接受方式）来“确定儿童教育和儿童读物的方针和办法”。至于“儿童立场论”者，因为他们强调“同”，所以主张要配合儿童相同的年龄特征（“智力低下”）与共同兴趣（“喜欢胡思乱想和鸡毛蒜皮”）写作，致使孩子们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生活。^②

如果细读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虽然比当时的许多理论研究者更强调“童心”、“儿童情趣”，更重视儿童文学的艺术性，但是他的基本理论观点，其实与批判他的人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分歧”。例如，他认为儿童文学“从属于政治而为政治服务”，儿童文学也可以写“重大”的主题和题材；他也曾经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文学作品特点作过具体的探讨。^③

张天翼对陈伯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批评，的确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阐释，则说明他重视儿童文学读者对象的特点。在《意见》一文中，他反对人们“缩小”儿童文学特殊性的“意义”。他说：

① 《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5日。

② 参《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5日。

③ 参《谈有关儿童文学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研组编：《儿童文学教学研究资料》，第1辑，页103—115。



如果对这个特殊性认识不足，以为给孩子们写作品和给成人写作品可以毫无区别，从作家来说，就不容易把作品写得适合孩子的需要。^①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指儿童的年龄特征，这并非张天翼的创见，^②但他十分重视儿童年龄特征，而且在实际创作中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能够在原则上给予人们比较具体的指导。例如，他说：

据调查，五年级以上的孩子们是喜欢看反映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的，因此，除了可以考虑从现在流行的优秀长篇小说中选择一批（其中有的可以成为节本）推荐给高年级的孩子们看以外，同时还要请作家们主动为少年儿童写作这类题材。这样做会更适合于小读者一些。^③

又如，他在《从人物出发及其它》中指出，要孩子们爱看、写他们自己生活的作品，“就要求我们写得真实、生动、深刻，具有典型性，符合孩子的生活、语言等特点”^④。他甚至指出：“一本好的儿童读物……在封面设计、装帧、插图等方面，也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和趣味，为他们所喜爱。”^⑤

（三）论儿童文学的创作原则

张天翼一向视儿童文学为教育工具。在三四十年代，他注重的是政治意识的灌输，到了50年代，他则转而重视儿童品质（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品质）的培养。

1959年，张天翼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集《给孩子们》的序里，提出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两个原则（或“标准”）——“受益”和“爱看”。

所谓“受益”，纯粹是从教育作用方面着眼的，因为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小读者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很大的影响：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比起其他的作品来影响更大，读者特别多……而且小孩子和成人不一样，他们看书都非常认真，一本书不论好坏，孩子看了以后，很快地就可以从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习惯等方面

① 《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5日。

② 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界大量翻译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几乎全盘移植自苏联。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主要强调：①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②儿童年龄特征对儿童文学的制约作用；③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须通过艺术途径来实现。参蒋风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页160—162。

③ 《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5日。

④ 参《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63。

⑤ 《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张天翼文学评论集》，页287。本文是张天翼1978年10月17日在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原刊于《文艺报》，1978年第6期。